

郑家建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历史向自由的诗 意敞开

《故事新编》诗学研究

郑家建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历史向自由的诗 意敞开

《故事新编》诗学研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向自由的诗意敞开:《故事新编》诗学研究/郑家建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6
ISBN 7-5426-2122-X

I. 历... II. 郑... III. 鲁迅小说—文学研究
IV. I2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61148 号

历史向自由的诗意敞开:《故事新编》诗学研究

著 者 / 郑家建

责任编辑 / 刘宏伟

装帧设计 / 范峤青

监 制 / 沈 鹰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 / 上海师范大学印刷厂

版 次 /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75 1/16

字 数 / 220 千字

印 张 / 15.75

印 数 / 1—4000

ISBN 7-5426-2122-X

C·100 定价:29.00 元

原序

严家炎

大约是三年半前，郑家建先生到北大来做博士后研究，曾将他的博士论文《〈故事新编〉诗学研究》打印稿送给我看。当时，这部十六七万字的论著，虽不完整（实际上只打印了已写出的论文的大部分章节），却无论在学术视野的开阔、艺术感觉的精微、作者文笔的活泼灵动方面，都给我留下了较深刻的印象。我曾向家建提议，可将论文做些补充加工修改后，争取正式出版。不料，家建并不满足于小修小补。他以高标准要求自己，继续刻苦读书和钻研，付出巨大的心血来完成此项工程。他不但夜以继日地读和写，往往连饭后都不肯休息片刻，以致胃部常感不适，疾病有所加重。过了两年，当家建再次将书稿交给我时，已是眼前这部厚厚的字数达30万以上的著作了。

我带着很大的惊喜，又读了这部修改后的书稿。此稿不但在篇幅上有较大扩充，框架结构上也有不少增补和调整，更加突出了“多重文化视野中的小说文本”这一主旨。作者从戏拟、隐喻、文体、古代传统、现代技巧诸方面对《故事新编》作了横向与纵向、内部与外部的综合考察，既有视野宽广的宏观论述，又在行文中有机地对各篇小说作了相当细致而富有独创性的阐释。以《起死》为例，家建摆脱了历来学者（包括我自己）对这篇作品几乎是雷同的解读法，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认为小说中哲学家/汉子“这个对立结构是知识者/民众这一意义结构的隐喻性表达”。请看第二章中的这段论析：

事实上，《起死》是《故事新编》文本中时间形式最复杂，也最具有隐喻性的一篇。在最表层的解读上，可以把《起死》看作是鲁迅对庄子哲学中的“齐物论”思想的一次绝妙的反讽。

但是，在深层上，文本中却隐藏着一个对立的意义结构：哲学家/汉子。我以为，这个对立结构是知识者/民众这一意义结构的隐喻性表达。对这一意义结构的思考是贯穿鲁迅一生的思想活动和精神追求。《起死》讲述的是，庄子复活了一个已经死去五百年的汉子。但是，当汉子复活过来之后，他唯一做的事就是向庄子要衣服穿。而庄子最后只好狼狈逃走。

家建在引用《〈呐喊〉自序》中要不要唤醒熟睡的人们共同毁坏铁屋子的一段对话之后，指出：“实际上，呐喊/彷徨，希望/绝望，确信/质疑的矛盾是一直贯穿着鲁迅一生的精神历程。即使在他成为左翼阵营的精神领袖之后，这些矛盾依然盘踞在他的心灵深处。所以，可以说，写在其晚年的《起死》既是鲁迅对其一生从事启蒙的思想追求的一种隐秘的自我反讽：对于复活的汉子来说，他所迫切需要的是衣服和食物，他根本无法也无心理解庄子所关注的那些思想；又是对所谓民众的怀疑：那些在铁屋中沉睡的将要死灭的人们，即使唤醒他们，又会怎样呢？这是一个现代性的质疑。”家建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颇为精彩的见解，真让人有通体豁亮之感——虽然未必每一位研究者都会赞同。再以《出关》为例，家建也提出了他独到的看法：

对《出关》的解读，最关键之处就在于：要读通“关”的意义，这是文本叙述的焦点。“关”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现实命运的一个象征。“关”是王权控制的界限。老子的西出函谷关，就是试图逃离王权的控制，然而，出了“关”又会怎样呢？这就如关尹喜所预言的“看他走得到，外面不但没有盐，而且连水也难得。肚子饿起来，我看是后来还要回到我们这里来的”。可见，即使暂时逃离了王权的控制，但仍然逃离不了生存的种种困扰。这就是一种摆在传统知识分子人生关口的尴尬。或许，这种尴尬也十分近似于鲁迅晚年的处境。晚年的鲁迅是相当孤独的，1933年10月21日，他在致郑振铎的信中说道：“上海……非读书之地，我居此五年，亦自觉心粗气浮，颇难救药。”1934年4月9日，在致姚克的信中，他又说道：“上海真是是非蜂起之乡，混迹其间，如在烘

炉上面,能躁而不能静,颇欲易地,静养若干时……”1935年9月12日,在致胡风的信中,他将“左联”中的某些领导人比喻成“在背后用鞭子打我”的“工头”。不久(1936年2月29日),他在致曹靖华的信中,明确表示了对于“左联”解散的不满,并表示不愿加入新成立的“文艺家协会”,“如有人说我破坏统一,亦随其便。”5月14日,在致同一人的信中更是感慨至极地说道:“近来时常想歇歇。”甚至,有一次,当一位朋友劝他换地方疗养时,他竟声调激越地反问:“什么地方好去疗养?!”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出关》是鲁迅对他自己的现实处境和即将做出的人生选择的一次最清醒、深刻的思考。

我曾经主张从表现主义的角度去理解《故事新编》(见拙作《鲁迅与表现主义》),可惜我自己的研究却是浅尝即止,并未下工夫去深入展开。读到家建的这些精辟论述,我顿时有“被照亮”而豁然贯通的感觉,因此非常钦佩和感谢家建的研究。家建善于从文本阅读中抓住那些由读者审美灵性与小说文本摩擦而生的电光石火,将它们积聚起来,成为反过来照亮作品艺术世界的集束光柱。家建的文学研究工作永远不脱离审美直觉力、感悟力,这是他的一个极大长处。正因为这样,《被照亮的世界——〈故事新编〉诗学研究》也就可能成为将《故事新编》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水平的标志。

如果说本书也有不足的话,我以为是在论述鲁迅边缘性思维的第六章。经过前五章对作品具体深入的论析,最后自然需要理论性的概括和抽象;但这种概括和抽象又不宜与前面的具体论析脱节,不宜离得过远,跃得过快。它需要一个中间环节,那就是对《故事新编》现代主义创作方法的探讨。有了这种准备,读者也许就不会有突兀之感。但这也只是我的一点朦胧的想法而已,未必很准的。

2001年4月18日

增订本自序

今天,终于有机会增订出版自己四年前的一部小书,内心深处感慨良多,说不清是愧疚还是喜悦,因为四年来我一直在为它的浅陋与粗疏而惴惴不安。

回想当初自己为何会选择《故事新编》研究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说起来似乎很简单:首先,在鲁迅研究中,《故事新编》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这样,自己的进一步探索就可能有较大的生长空间;其次,《故事新编》是一部有特点的小说集,它的怪异与难解,对每一位研究者来说,既是一种诱惑也是一种挑战;第三,在《故事新编》研究史上,有许多名家都作过创造性的阐释,这就给我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高的起点。就如一个人站在群山的顶峰,他只要稍微踮起脚跟,所能看到的视野一定会比在山脚下的人们来得显豁、开阔,即使山脚下的人有再好的弹跳力。这种选题的经验后来一直成为我开拓新研究领域的标尺。因为研究的课题如果学术积累太深厚,一时间是不容易出新意的。然而,如果选题的学术积累是一片空白,那么,又找不到一种参照尺度来评判你的研究成果的学术高度,因而也无法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同样,如果你选择的研究对象本身没有特色,除非你真能“妙笔生花”,否则,你的研究就不可能有新鲜感。总之,我的选题经验是要“不新不旧”、“不多不少”。后来,当我有机会需要指导学生的学位论文时,我总是用这八个字建议他们。也许,我的经验只适合我自己,我的建议也可能误了他们,那是我的罪过。

在研究过程中,我总是精心地对待研究路线的设计。我个人认为,这就有如一个登山者在攀登之前需要对攀登路线十分了解一样,否则

就容易迷途而忘返。当然,从数理逻辑上说,过程中两点之间直线最短,但是,在人文探究中,不可能存在着所谓绝对的直线。思维过程中必要的绕弯、曲折甚至往返都是不可避免,也许正是这些绕弯、曲折,使你的思维路线呈现螺旋式上升的可能,就如登山者,若有心去选择一些岔道僻径,你就有可能领略到更奇丽的风光和体会到更多的探索之乐。因此,在研究路线的设计中,我会尽可能考虑到那些必要的弯度甚至必要的回返。我想,这是一个明智的研究者所必须具备的心态。

在研究方法上,我比较注重关键词的选择,这也许与我喜欢阅读词典的习惯有关,如波兰作家切斯瓦夫·米沃什的《米沃什词典》,美国理论家艾布拉姆斯的《欧美文学学术语词典》,英国理论家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这些著作读起来都会令我十分振奋。在我看来,研究中的关键词,就像夜空中的星星,正是这星星点点使黑暗的夜空变得绚丽多彩,变得深邃悠渺。一个关键词的准确选择,常常会使你在百思不解之中,豁然开朗。当然,在理论的推进过程中,关键词的外延和内涵会在一定限度内发生变异,这是思维的必然。因此,当一个研究者找到一个关键词时,不应该像一个吝啬鬼握住一枚硬币一样,紧紧不放,他应该把这硬币放在手掌中,正反两面地看一看、瞧一瞧,甚至抛向空中,看一看它落下时优美的曲线。你说,流星不是因为划过夜幕才显得美丽吗?

如果说在文学研究中,研究路线的设计犹如一根经线,关键词是系在经线上的铃铛,那么,研究者的审美感受力,就是那只抓住经线并抖动铃铛的“看不见的手”,这时,你的铃声是否美妙悦耳,就全在你的掌握之中。记住,请不要太轻,也不要太重。

是为序。

目 录

原 序	严家炎	1
增订本自序		1
绪 论 照亮的意义		1
第一章 戏拟——《故事新编》的语言问题		21
第一节 戏拟的类型分析		23
第二节 戏拟与鲁迅晚年的思想、心灵		35
第二章 隐喻——《故事新编》的创作思维		46
第一节 隐喻与《故事新编》的时间形式		48
第二节 隐喻与《故事新编》的空间形式		58
第三章 现代“奇书”——《故事新编》的文体特征		75
第一节 旧事新编、新事旧编的叙事策略		75
第二节 “文体越界”与“反文体”写作		92
第四章 遥远的回响——《故事新编》与文学传统		105
第一节 神话、庄子与想象力传统		105
第二节 史传的叙事智慧与小说家的诗学情怀		122

第三节 “油滑”新解	138
第五章 隐现的缪斯——《故事新编》与现代技巧	153
第一节 另一种解读：《故事新编》中的蒙太奇艺术	153
第二节 想象与遨游：《故事新编》的绘画感	170
第三节 文化的记忆：《故事新编》与《卢奇安对话集》 的比较研究	186
主要参考文献	205
后 记	206
附录一 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再出发	208
附录二 论 20 世纪中国小说研究的几个生长点	228
增订本后记	244

绪 论

照亮的意义

我习惯于深夜沉思。

当白昼的喧嚣终于沉寂下去时，夜的氤氲也就悄然地在升腾、弥漫……随之，自己的心绪也变得深浓。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被一个念头所紧紧追逐、折磨：60 多年前，在这个都市^①的另一面，同样的深夜，那个伟大的悲剧的灵魂：^②鲁迅，究竟在想什么？——

夜阑人静，当他伫立凝视那深邃而又神秘的星空时，他是否感到更深的寂寞和孤独？

在那飘忽不定的烟圈中，他究竟看到了什么？是布满自己和别人所加的创伤的“过去”？抑或是黑暗、沉重的“现在”？

要知道，此时他业已五十有几：一个知天命的年龄。

窗外是黯淡、无尽的深夜，那个念头却不断地生发出种种闪烁不定、难以捉摸而又勾人心魄的幻影，纠缠着、蛊惑着我，在我的思想中，

^①写作本书时，我正在上海的华东师大中文系师从钱谷融先生攻读博士学位。

^②唐弢：《鲁迅传——一个伟大的悲剧的灵魂》，见《唐弢文集》，第6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

就像地狱里受尽煎熬而找不到出路的灵魂一样充满躁动。^①

有人说：人们敲遍所有的门，一无所获。唯一那扇通向目标的门，人们找了一百年也没有找到，却在不经意中碰上了，于是它就自动开启……^②

我渴望着这样令人目眩的启示。

于是，在上个炎热的夏季，我又重读了一遍《鲁迅全集》。对于鲁迅的著作，我并不陌生，我很小的时候就有机会读到它。这次当我一本又一本本地重读时，它唤起了我对过去的回忆。小时候，我最喜欢读的就是《故事新编》，那时是把它与《山海经》等神话书放在一起读的。书中夸张、怪诞和谐趣的描写，曾给我童稚的心灵许多欢乐和幻想。这次重读，我看到的依然是夸张、怪诞和谐趣，却激不起任何的幻想。它带给我的反而是一种真实的感受，书中那些人物的情形，他们说话的口吻、神态，难道我们不是常常能在周围的人们身上看到、听到、想到吗？一种最深刻的真实却是通过最怪诞、夸张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一种多么不可思议的创造！此时，我感到有某种新的疑惑在向我逼进：他为什么要把小说写成这个样子？于是，我又反复地阅读这个文本，疑惑在经过不断的自我追问、反诘之后，渐渐地凝结为下面的问题意识。

（一）鲁迅的创作总是与他的生命状态相联结。当他处于孤独、消沉、寂寞的时候，他总是回到创作上来，体味自己，省思自己，然后又重新点燃自己前行的火焰。《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都是创作于鲁迅心情最寂寞、孤独，甚至最黑暗的时期。这一现象启发我：在生命历程的最后岁月中，鲁迅又重新提起笔来创作小说，这是否意味着鲁迅又回到自己的内心，重新体味自己的孤独、寂寞呢？我们能否通过对《故事新编》的解读，使得我们对鲁迅晚年的思想、心灵有着一个更丰富、更深入的把握和理解呢？《故事新编》中充满着对世界、对人的存在的荒诞感，并且，这种荒诞感在写于晚年的五篇小说中更是得到了一种整体性的渗透和张扬。我不禁要追问：这种越来越强烈的荒诞感，在鲁迅晚年的思想、心灵中究竟具有怎样的意义？它折射出一种怎样的思

① 安德烈·莫罗亚著，施康强译：《〈追忆逝水年华〉序》，第2页，译林出版社1994年版。

② 安德烈·莫罗亚著，施康强译：《〈追忆逝水年华〉序》，第3页，译林出版社1994年版。

想和生命状态呢？

（二）《故事新编》中的八篇小说，断断续续历 13 年而写成，但是，令人惊奇的是，这八篇小说在艺术构思、表现手法以及风格特点上都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这一现象是否意味着鲁迅一直是在探索、尝试着一条不同于《呐喊》、《彷徨》的创作道路呢？

（三）在艺术感受方式和表现方式上，《故事新编》更接近于《野草》的创作，这二者有着互文性的内在关系。同时，它自身在艺术渊源上又是多元的。这就促使我思考：在鲁迅创作史乃至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故事新编》究竟提供了哪些独创性的审美价值和审美方式？这对我们探讨、建构中国现代小说诗学将提供怎样新的视角？

如果说，每一次的求知与探索都是受胎于疑问的诱惑，那么，上述的三个疑问就是贯穿我整个研究过程的问题意识，也可以说是我的研究目标。

我的思索和写作就从这里开始。

二

从构思到写作，我的研究思路有一个较大的转向，我自以为，这一转向对我能否更深入地解读《故事新编》，意义是重大的。刚开始时，我的研究思路是想从已有的论争问题入手，试图通过对《故事新编》研究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如“油滑问题”、“体裁问题”、“创作方法问题”等，做出自己新的阐释，从而进入文本的解读。但是，我很快就发现，这条研究途径实际上是陷阱四伏：一方面，一旦直接从这些论争的问题入手，很容易就会把文本搁置起来。也就是说，研究的目标和意义变成仅仅是一种对问题的回答。相反地，作品文本则成为每个研究者为了印证自己的解答而可以任意支离、抽取的外在材料。因此，从问题入手，即使对这些论争的问题能提出新的看法和作出新的阐释，但这些看法和阐释也必然会漂离文本越来越远，甚至可能变成纯粹的“为问题而问题”。另一方面，这些论争的问题从被提出之日起，至今已被几代的研究者不断地加以阐释，在这一提出/解答的漫长的研究史过程中，这些问题已内在地生成一种思维惰性，这不仅制约着我们对作品文本

的深入解读,同时也阻滞了我们在理论上的创新。

怎么办? ——

还是让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吧!

于是,我义无反顾地抽身而去。

我意识到自己正处于思路转向的关口:我必须找到属于自己的研究方法和途径。

虽说抽身而去是容易的,但要找到自己的研究路子却是艰难的。正当我为此而苦苦思考、探寻的时候,忽然,一个无意中听到的词汇:“照亮”,划过我混沌、黑暗的脑海,使我顿时有豁然开朗之感。如果你曾有过漂泊的经历,那就会理解我要说的:在夜行的列车上,透过车窗,你总会看到:在那远川,那天地尽头,或者是在黑黝黝的树林中,总有那么一点灯光在孤独地闪亮着。这时,你也许会模糊地猜想,那是从农舍的窗中,或者从门缝中泄出来的,你会想象着灯下的家居情景,你可能甚至会情不自禁地在想象中描绘那陌生而又似乎熟悉的面庞。^①这时,你一定会怦然心动,想起自己的家人,还有回家后即将享受到的温暖,或是仍萦绕在你耳畔的灯下的话别,这一切都会使你心绪激荡。^②这时,车窗外那摇曳的灯火和那远山、远水、远树、远屋都渐渐地摇荡在一起,在你漂泊的心灵中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③如果这时,你是一个病羁异乡的游子,独自一人蜷缩在陌生的客舍,当你在一阵疼痛中惊醒的时候,突然看到门下透进一丝光芒,你会感到宽慰。也许,你会脱口而出:谢天谢地,总算天亮了。^④也许,就是这一点点的灯光照亮了艰辛跋涉的漂泊生活的全部意义;也许,就是这一线光芒照亮了期盼已久的希望;也许,就是这闪烁飘忽的灯光,使得你有机会照亮自己深邃而又幽秘的心灵。法国作家法朗士有句名言:批评是灵魂在杰作中的探险。在我看来,每一部杰作都是一片深邃的海洋,就如任何一个饱经风雨的航海家都需要灯塔的照引一样,面对着文本,我们同样需要点燃灵

①参阅赵园:《独语》,第54~56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②普鲁斯特著,李恒基等译:《追忆逝水年华》,第3页,译林出版社1994年版。

③同①。

④同②。

魂和智性的灯火。此时,我深深地意识到:我必须真正地潜入《故事新编》的文本世界中去,借助于对作品文本的细致解读,找到新的意义亮点,提升出一套新的理论设想,然后,用这套新的理论设想去重新“照亮”作品文本。我以为,只有这种“照亮”才可能使文本从半明半暗的自在状态中浮现出来,文本中的一些长期被忽视或隐晦的内涵,才可能变得清晰、透明起来。

对“照亮”意义的发现,带给我强烈的兴奋感和研究冲动。我意识到:我将整装待发,重新上路。就像每一个长途跋涉的探索者一样,在启程前,我还是耐下心来,做更扎实的准备。于是,我一方面重新潜入文本,以自己的阅读感受作为前行的路向;另一方面,我必须对以“照亮”作为自己的研究方法的可靠性作出更周密的论证。为此,我又回到了鲁迅的学术思想、方法上来。鲁迅曾经有过撰写中国文学史的计划并且拟定了章节,也向他的挚友许寿裳讲过大意。^①据许寿裳回忆,他把六朝文学的一章定名为“酒·药·女·佛”。^②显然,这四个字是鲁迅从六朝文学所处的时代背景、社会思想、文人生活以及中古文学史的特征中概括、生发出来的。^③这种概括真可谓“一字千钧”,它具有深刻的理论穿透力:既能把握住这一时期具体丰富的文学历史现象,又能穿透这些现象,从中抓住那些最能体现这一时期的文学特征的规律性的东西。^④王瑶先生曾把鲁迅的这一文学史研究方法,称为“典型现象”法。^⑤或许,这也可以称为“照亮法”。就如灯塔的意义是双重的:它既告诉人们这一片海域是充满危险,这里有暗礁与险滩、潜流与漩涡;同时,又导引着人们更安全地穿越这片海域。可以说,“酒·药·女·佛”这种概括,既把六朝文学生命化、复杂化,同时,又使得作者对这一段文学史的探索明晰化。在这里,我不禁想到,也许“存在”就是一种神秘与敞开,幽深与透亮的统一。比如,蒙娜丽莎的微笑是最自然的,同时又是最神奇、诡秘的。我想,对于一位伟大的智者来说,他思维的创造性

①钱理群:《心灵的探寻》,第19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②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第5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③同①。

④王瑶:《关于现代文学研究的断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4期。

⑤同④。

和深刻性之处，就在于能够以自己的方式同时穿透“存在”的两面性。

接着，我在费孝通先生的《旧著〈乡土中国〉重刊序言》中读到相似的看法，费孝通先生在谈到自己的《乡土中国》一书的研究方法时，说道：

我这种尝试，在具体现象中提炼出认识现象的概念，在英文中可以用 Ideal Type 这个名词来指称。Ideal Type 的适当翻译可以说是观念中的类型，属于理性知识的范畴，它并不是虚构，也不是理想，而是存在于具体事物中的普遍性质，是通过人们的认识过程而形成的概念。这个概念的形成既然是从具体事物里提炼出来的，那就得不断地在具体事物里去核实，逐步减少误差。我称这是一项探索，又一再说是初步的尝试，得到的还是不成熟的观点，那就是说如果承认这样去做确可加深我们对中国社会的认识，那就还得深入下去……^①

写到这里，我内心感到一种充实。我知道，任何一种发现或创造，都是从旧的结节上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的（别林斯基语）。我无意于把这种研究方法归功于自己的发现或创造，也同样无意于把自己的研究方法与前辈学者的学术思想、方法相攀附。然而，我还是执著地要对自己的研究方法进行如此的命名，是因为我渴望着这一次的研究和写作在“照亮”复杂、深邃的文本世界的同时，能照见“文本”背后那个不安、沉默的灵魂，也能照见自己年轻的生命。

因此，“照亮”对我来说，是一种心灵之眼，生命之光。

三

研究方法——用一套新的理论设想或者说概念系统从整体上“照亮”《故事新编》的文本世界——确定之后，接着就必须进行“亮点”的选择。这时，有两个方面的研究预设一直在提醒着我：一方面，这些“亮点”必须是从文本自身中生发出来的，即必须建立在自己对文本的艺术特征的丰富感受、把握之上。另一方面，这些“亮点”不能如星光点点，

^① 费孝通：《乡土中国》，第3页，三联书店1985年版。

而是必须能建构起或者说能贯穿起一个相互联系又不断扩展与深化的概念系统。这种对“亮点”的选择、确定和建构过程,就是对自己研究路线的设计过程。在这一研究路线的设计过程中,文艺理论家韦勒克和英伽登对文学作品的分析理论都给了我重要的启发。如英伽登把文学作品分成四个层面:第一层面是声音的层面。第二层面是意义层面,在这个层面,有意义的句子和句子系列展现出处于具体情境(事件、发展)中的客体(人物、精神状态)。客体的这种“展现”发展出一个有机的、有意义的综合体、一个特定的“世界”。在意义的层面上产生了第三个层面,即所谓“观点”的层面。在这里,作者与读者的“意向性经验”产生了遭遇,并由此进到最后一个层面,即所谓“形而上学”的层面。^① 我以为,英伽登的这种分析方法,虽然是清晰、递进的,但是,显得过于复杂。我的办法则是从《故事新编》作品文本的意义适应性和理论承受力出发,对英伽登所分析的层面进行“简化”,使自己所设计的研究路线和理论框架尽可能地具有可操作性,也就是说,从《故事新编》文本实际出发加以理论方法上的选择。于是,我选择了“语言层面”、“创作思维层面”、“文体层面”这三个亮点,力求能建构起一个有机的、递进的研究路线。

我一直认为,鲁迅是一个诗人,并且是一个主观性很强的诗人。在他的任何创作中,都浸润着他的全部生活、全部感情、全部灵魂。因此,在对研究路线设计的过程中,我时时提醒自己:必须借助对作品存在方式内部的各层面的分析、解读,从而把文本主体化、生命化,即力图把对“语言”、“创作思维”、“文体”这样的内部研究与对作家心灵的解读结合起来,走一条“作品文本 $\rightleftharpoons$ 作家心灵”的双向对读的研究路线。

在研究路线的设计过程中,我引进或借用了许多术语。为了使我们对文本的分析、解读建立在一种清晰、明确的理论框架上,在引论中,我将不得不对这些术语的特定内涵以及我切入文本分析的角度作出谨慎的阐释。

“语言问题”是我研究路线的第一站。当我们刚进入《故事新编》文本的解读时,第一个带给我们冲击力的就是《故事新编》语言的“怪味”。

^① 英伽登著,陈燕谷译:《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此处参阅黄子平:《沉思的老树的精灵》,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